

教师必读文库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选
总主编 冯克诚



(第四辑·第四卷)

[宋—清] 历 代
(公元 960 ~ 公元 1911)

训蒙教育与训蒙要籍选读 (上)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
学苑音像出版社 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第四辑/北京师联教育科学
研究所主编.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6. 5

ISBN 7 - 80135 - 740 - X

. 中... . 北... . 教育名著 - 作品综合集 - 中
国文学 . 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1429 号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第四辑
[宋—清] 历代训蒙教育与训蒙要籍选读(上)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选

总主编 冯克诚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版发行
学苑音像出版社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印刷

2006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1/32 印张: 195 字数: 5066 千字

ISBN 7 - 80135 - 740 - X

全二十册定价: 526.00 元(册均26.30元)

(ADD: 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邮局 10 号信箱)

P. C. : 100024 Tel: 010 - 65477339 010 - 65740218(带 Fax)

E - mail: webmaster@ BTE - book. com Http: //www. BTE - book. com

教师必读文库
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出版说明

教师职业化、专业化是当今世界教育改革共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之一。教师职业素质素养达到基本要求和提高,是当前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的急迫要求。为此,我们组织相关专家重新系统地、较完整地遍选、编译、评注了这套适合中小学教师职业阅读的《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其编选原则和方针是:

1. 从古至今,各时代、各地区和国家有代表性,和对当代及后世教育发生直接影响的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品、经典论述。教育家的教育实践风范和教育思想对当代和后世的影响远大于制度影响,同时,对现实教师的成长也有借鉴和参考作用。作为职业教师,总听说、总涉及但在学校图书馆里总缺乏的那些著作是我们这次系统编选的重点。

2. 全套分中国卷 100 种、外国卷 100 种,每二十种为一辑,共十辑,约 200 种,同时出齐。每种含教育家的生平、教育事迹、教育成就、教育思想评析和经典教育论著选读及注解解读导读两部分。这对于全面深刻和原原本本地了解学习、运用教育家的思想和著作是十分有益的。

编者

2006 年 4 月

目
录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第四辑·第四卷

[宋—清] 历代训蒙教育与训蒙要籍选读(上)

上 篇

历代蒙学教育思想和方法

历代蒙学概要	(1)
历史上的蒙学	(1)
清代蒙学的师生	(2)
清代的蒙学教材	(4)
清代蒙学动教学方法方式	(5)
小学和大学	(7)
明清时期的家训发展	(11)
(一) 明初至清代前期: 鼎盛时期	(12)
(二) 清代后期: 整体衰落与局部开新时期	(16)
(三) 明清家训内容及教化实践的特点	(17)
(四) 清后期传统家训衰落的原因	(25)
蒙学内容	(27)
历代训蒙方法	(33)

下 篇 (一)

历代蒙学教育论著选读

程董二先生学则	(43)
童 蒙 训	(47)
少仪外传	(92)
家塾常仪	(171)
童蒙须知	(175)
白鹿洞书院学规	(179)
小学·嘉言	(181)
史蒙卿、程端礼的教育活动和读书理论	(207)
(一) 四明学风及其源流与特征	(207)
(二) 史蒙卿、程端礼的讲学活动、学术渊源与为学宗旨 ...	(217)
(三) “ 读书工程 ”——史蒙卿、程端礼的读书思想	(225)
(四) “ 读书工程 ”对书院教学的影响	(252)

上 篇

历代蒙学教育思想与方法



历代蒙学概要

《清稗类钞》有一首嘲私塾七律诗：“一阵乌鸦噪晚风，诸生齐放好喉咙。赵钱孙李周吴郑，天地玄黄宇宙洪。《三字经》完翻《鉴略》，《千家诗》毕念《神童》。其中有个聪明者，一日三行读《大》《中》。”勾画出了清代蒙学教学活动情景。

历史上的蒙学

蒙学不自清代始，在中国是早已有之。《学记》说“党庠”“术序”，当是早期地方蒙学的雏形，或是一种设想。其有历史可考者，则为汉代的书馆。王国维《汉魏博士考》：“汉时教初学之所名曰书馆，其师名曰书师，其书用《仓颉》、《凡将》、《急就》、《元尚》诸篇，其旨在使学童识字习字。”王充《论衡·自纪篇》也提到他“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僮百人以上，皆以过失袒谪，或书丑得鞭”。魏晋南北朝时期，魏人邴原，在书舍，“一冬之间，诵《孝经》《论语》，自在童齿之中，嶷然有异”。这里说的书舍即蒙学。晋人束晰撰《发蒙记》、顾恺撰《启蒙记》，梁周兴嗣作《千字文》，后齐颜之推作《训俗文字略》，都是当时蒙学教育活动的反映。唐代有个窦易直，曾“就业村

第四册《嘲私塾诗》。

见《观堂集林》卷四。

《三国志·魏志·邴原传》。

学教授”，顾蒙在广州书写“《千字文》授于聋俗”。著名的童蒙课本《蒙求》即唐人李瀚所作。元稹的《长庆集》说“予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诗”。唐代还有《兔园册》，经考证为“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于“五代时行于民间村塾，以授村童”。宋代“都城内、外……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南宋诗人陆放翁《秋日郊居》诗：“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着面看人”。作者自注：“农家十月乃遣子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政府劝农立社，社立社学，“农隙使子弟入学”，这社学也是蒙学性质。明代社学亦在各府州县建立，收民间幼童 15 岁以下的入学，“讲习冠婚丧祭之礼”。明初《文渊阁书目》和《绿竹堂书目》记载有《对相识字》一书，“对相”就是对图之意，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看图识字课本，说明蒙学课本到了明代，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新的发展。

清代蒙学的师生

清代的义学、义塾、村学、村塾，都是一种蒙学。有的是地方政府设立，有的是地主、商人设立，有的由市民或农民集资设立。它的主要教育对象为 15 岁以下儿童，入学的多数为城市民子弟和农村的农民子弟。其中，有的只求粗识些文字，就走上谋生的道路；少数升入

赵鏞《困话录》卷六。

《唐摭言》卷十。

《观堂集林》卷二十一《唐写本龟园册府残卷跋》。

耐德翁《都城纪胜·三教外地》。

钱大昕《十驾斋新录》卷十六。

《元史·食货志》。

明史·选举志

高一级教育结构,如当地的小书院;也有的当作科举应试童生的预备性教育。

蒙学教师简称蒙师,有的是当地的童生或穷秀才,有的连童生秀才头衔也没有。《儒林外史》第二回描绘山东薛家集一个六十多岁蒙师周进,“却还不曾中过学”,即仅仅是个童生,没中上秀才。他偶尔到贡院门口想挨进去看看,却“被看门的大鞭子打了出来”。家长贽见蒙师,赠送的银子,“合拢了不够一个月饭食”。“潦倒青衫”,是蒙师生活的普遍写照。清代光绪年间有李森庐的,以出外教读谋生,某年逼岁除,不能归,寄其妻诗,有“我命从来实可怜,一双赤手砚为田。今年恰似逢干旱,只半收成莫怨天”句,这不止光绪时为然。生活于康熙、乾隆年间的郑板桥,早年家贫也当过蒙师。既达,作诗自嘲:“教读原来是下流,傍人门户过春秋。半饥半饿清间客,无锁无枷自在囚。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子弟结冤仇。而今幸作青云客,遮却当年一半羞。”

蒙师文化水平低,有的连《三字经》《千字文》犹不能卒读,乃有“先生不如鼠”之嘲,意思是老鼠于无米。油可窃时,还会于故纸堆中啮书籍。

蒙师文化水平低,和他们的生活待遇有关系,因为稍有才识、衣食有奔头的,都不愿当教师,所谓“家有三斗粮,不作孩子王”。他们在社会上无地位,归根结底是政府不重视。清教育家张履祥曾慨然言之:“蒙师之责至重,而世轻贱之。举业之学至陋,而世尊隆之。可谓不知类矣!”清崔学古也呼吁改变蒙师状况,指出:“为师难,为蒙师更难。蒙师失,则后日难为功;蒙师得,则后日易为功。甚矣,不可不慎也。”

《清稗类钞》第四册《教读原来是下流》。

《杨园先生全集·备忘录》卷一。

见所著《幼训》。

清代的蒙学教材

清代蒙学教材,同前代一样,离不开“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但有增补内容。例如,相传为宋王应麟编的《三字经》,明清以后内容就有新的补充,如清初黄周星的新编《三字经》、道光间连恒编的《增补注释三字经》。至于光绪年间《时务三字经》还揭露帝国主义文化侵略,那是鸦片战争以后行世的了。宋初人编的《百家姓》,到明代有吴沉等编的《皇明百家姓》,改“赵”字开头为“朱”字打头。署康熙皇帝编的《御制百家姓》又改为孔夫子开头(“孔师阙党”)。周兴嗣编的《千字文》,到明清也有各种续编本、改编本,如清何桂珍的《训蒙千字文》、李崇忠以“天地定位”开头的新编《千字文》都流行一时。此外还有《千家诗》(乾隆间还出了一本《国朝千家诗》,专收清人作品)、各种《蒙求》、《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童蒙观鉴》(清丁有美编)、《鉴略》(清初王仕云编)、《声律启蒙》、《增广昔时贤文》、《神童诗》、《大学》、《中庸》、《孝经》、《论语》等。亦有儿童必读或常读之书,如《太公家教》,清兵入关前,在东北满族蒙学中即已流行,有满文刊本。《八旗通志·阿什坦录》载阿什坦通满汉文字,顺治年间“翻译《大学》、《中庸》、《孝经》、《通鉴总论》、《太公家教》等



《御制百家姓》清康熙年间原刊本

书刊行之”。

以上各种蒙学课本,从形式言,有运用故事、名物掌故、谚语、格言、对子、诗歌等体裁,都以简赅的文字,严格的组句(三言、四言、七言)、整齐的押韵表述。除少数的比较艰深外,一般都通俗易懂易记。蒙书内容除了宣传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外,还包括历史知识、自然知识、生产知识、文字知识(掌握文字工具,包括辨音、辨形、语法、作文)、日常生活知识。例如《三字经》,既有三纲五常说教,也讲历史的治乱兴衰,和生产领域中的“六谷”、“六畜”。《千字文》的“云腾致雨,露结为霜”,说的则是自然现象。关于立身处世,有些蒙书是地地道道的封建说教,而有些则讲身心修养,如《千字文》的“知过必改,得能莫忘”。有些基本上还能跟上时代潮流,如《时务三字经》写着“今天下,五大洲,东与西,两半球”,那是鸦片战争以后的编辑出版。

清代蒙学动教学方法方式

蒙学中由于童蒙入学年龄不同,年龄同者又有程度的参差不齐,不同阶层的家长要求也各异,因此大都进行个别教学。程度高者学“四书”“五经”,低者学《三字经》、《千字文》以至杂字。

童蒙的第一阶段学习,是识字,即集中一段时间,认识字块,字数一般为两千上下。清王筠的《教童子法》就说:“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先取形象、指事之纯体教之。识‘日’‘月’字,即以天上日、月告之;识‘上’‘下’字,即以在上在下之物告之,乃为切实。纯体既识、乃教以合体字。又须先易讲者,而后及难讲者。……解识二千字,乃可读书”。清崔学古也概括了识字二法:纸上识字与书上识字,“何谓纸上识字?凡训蒙勿轻易教书。先截纸骨方广一寸二

转引自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

分,将所读书中字楷书纸骨上,纸背再书同音,如‘文’之与‘闻’、‘张’之与‘章’之类,一一识之。又遇姿敏者,择易讲字面,粗粗解说。识后用线穿之,每日温理十字或数十字,周而复始,至千字外,方用后法教书。……何谓书上识字?凡教生书,先令本生就书上字逐字挨认,遇不识字用朱笔圈出,又用墨笔写在书头,最为易记。又有辨字一法,如‘形’之与‘刑’,‘扬’之与‘杨’,声同而笔画边旁不同,如‘已’之与‘己’,‘行’之与‘行(杭)’,……字同而用之不同;又‘星’之与‘心’,‘登’之与‘敦’,声近而用舌用齿又不同。诸如此类,必细辨之”。

集中识字是我国蒙学长期的教学实践经验总结,根据汉语、汉字的特点(大部分是合体字和形声字)和规律,使这种教学方法成为必要和可能。

读、写、作是蒙学教学的三部曲,读是读书,写即习字,作为作文。读书首重朗读,童蒙或齐声朗读(相同教材),或各朗读其书。清上虞人陈燧的《村塾赋》,有“在蜜蜂窝里,由我称王”,和“尔其为闷也,如蚊蚋之并集于座;如婴孩之群号于床”等语。次重背诵,教师教书,初不要求儿童透彻了解文义,因此也不作详尽解释,只令儿童先读熟,会背诵,认为熟了将会自然领会,相信“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朱熹也早有“读书自然晓”之说。

习字,即习毛笔字,有把腕、描红、仿影、临帖到无依傍。把腕,描红最普遍的是写“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清初褚人获的《坚瓠集》说它“大抵取笔画稀少,童子易于识认耳”。后来不知从何时开始,坊间还出了描红本子,字为“一去二三里,前村四五家,高楼六七座,八九十枝花”,亦取其

崔学古《幼训》。

《清稗类钞》第四册《村塾赋》。

《坚瓠集》壬集卷四。

笔划简单并押韵。仿影、临帖,多取颜、柳、欧、苏字体,也是习字的基本功,大楷从颜、柳,小楷从欧、苏。先习大楷,后习小楷。每天都习字。蒙学习字,又往往同集中识字相配合。

作文训练,历史上几个文字大家,对初学者都提倡放,用现代语言,即敞开思想。宋人谢枋得编《文章轨范》,内容分“放胆文”和“小心文”两部分,他说“凡学文,初要胆大,终要心小……初学熟之,开广其胸襟,发舒其志气”,则“必能放言高论,笔端不窘束矣”;欧阳修论文主庄严典重,但他《与澠池徐宰》书中也说“作文之体,初欲奔驰”。清代许多蒙学已开始教八股文。章学诚的《古文十弊》说到:“塾师讲授四书文义,谓之时文,必有法度,以合程式。而法度难以空言,则往往敢譬以示蒙学。”农村一般不提倡学八股文,有些城市也如此,这就不受老框框的束缚。王筠的《教童子法》便说:“初学文,先令读唐朱古文之浅显者,即令作论,以写意为主,不许说空话。以放为主,越多越好,但于其虚字不顺着,少改易之,”《事林广记》里的《速成法》,也说“若改小儿文字,纵作得未是,亦须留少许,不得尽改。若尽改,则沮挫其才思,不敢道也”。清唐彪的《父师善诱法》也提到“先生于弟子之文,改亦不佳者,宁置之”,反对“不可改而强改”,以免“学生阅之,反增隔膜之见”。

蒙学儿童除了学作文,还学作诗,由属对做起,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声律启蒙》即为学习作诗的课本。

蒙学的学生管理,离不开体罚。从罚跪(学塾中悬有孔子像者,则罚跪在孔子像前)到鞭笞。饥饿纪律(不许学生回家吃饭)也是蒙学中变相的体罚。教师用的是压服,而不是用说服方法,夏楚、戒方成了他们主要的凭藉,后人乃又有“抬头伯看先生面”,“宛如老鼠见狸猫”之嘲。

小学和大学

主要是从教育的目的着眼,在我国历史上,一个人接受教育的

过程被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从表面上看,小学和大学的划分更多地考虑的是受教育者的年龄,比如《大戴礼记·保傅》:“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古人二十岁束发而冠,束发而就大学即是指二十岁进大学。又如《尚书大传》也说:“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嫡子,年十三岁入小学,见小节而践小义;年二十入大学,见大节而践大义。”再如《汉书·食货志》在叙述“先王教人之大略”时则说:“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记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古者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更是一种经常化的说法。其实,不论属于小学阶段的教育,抑或是属于大学阶段的教育,年龄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二十岁以上的成人在农闲时节,到私塾或村学中接受启蒙教育的极其普遍。并且,上述小学大学阶段的年龄起迄也不尽一致,而实际情形只能是比这种不一致的说法更不一致,以至于年龄不能用作划分小学和大学的标准。

以教育内容和教育目的为划分小学和大学的标准,才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宋代学者吕大临说:“小学之教,艺也、行也;大学之教,道也,德也。礼乐射御书数,艺也;孝友睦任恤,行也;自致知至于修身,德也;所以治天下国家,道也古之教者,学不躐等,必由小学,然后进于大学。自学者言之,不至于大学所止则不进;自成德者言之,不尽乎小学之事则不成。”元代学者许衡的说法则兼顾了入学年龄和教育内容这两个要素:“古者民生八岁,上至王公,下至庶人子弟,皆令入小学,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岁,自天子之元子众子,公卿士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者,皆入大学,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在他看来,“先之

以小学者，所以立大学之基本，进之于大学者，所以收小学之成功也。”清初学者陆桴亭也说：“小学之设，是教人由之；大学之教，乃使人知之。”

对小学和大学教育目的、教学内容论述得最充分、最精彩的，还得数朱熹。“古者初年入小学，只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学，然后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为忠信孝弟者。”“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兄等事，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就上面讲究所以事君、事父兄等事是如何。小学之事，知之浅而行之小者也；大学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可以说，小学要学的是形而下的事，大学要教的是形而上的理。朱熹还说：“方其幼也，不习之于小学，则无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而为大学之基本；及其长也，不进之于大学，则无以察乎义理，措诸事业，而收小学之功。”门对“古人小学，养得小儿子诚敬善端发见了，然而大学等事，小儿子不会推将去，所以又入大学教之。”“小学，是学事亲、学事长，且直理会那事；大学，是就上面委曲详究那理，其所以事亲是如何，所以事长是如何。”这就是说，小学是大学的基础，大学是小学的升华。小学教育，限于洒扫应对进退之节，懂得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朋友之交、长幼之序，学会谨守心术之要、成仪之则、衣服之制和饮食之节，而大学阶段，更要把这些礼节的道理考究清楚，在知道了应该怎么去做的基础上，进而弄明白为什么应该要这么去做。换言之，小学阶段的教育是要学会遵循封建伦理道德，而大学阶段则要把这种道德深化为内在的自

张伯行《小学集解·小学辑说》。

许衡《小学大义》。

陆桴亭《论小学》。

张伯行《养正类编·小学》。

张伯行《小学集解·小学辑说》。

张伯行《小学集解·小学辑说》。

觉,达“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在论述小学和大学的关系时,古人特别强调小学的重要性,童蒙教养成正道,被看作是至高无上的功业德行。所以如此,就在于小学乃是“作圣之基”。“故学圣人之道,必自小学始,否则虽欲勉焉而进于大学,犹作室而无基也。成亦难矣。”只有以小学的“下学”为基础,才能有大学的“上达”,没有理会后生小儿的学问,而径直“语上”,那就是躐等,就不会有成。小学的过程,是立大本的过程,“大本既立,然后大学功夫循序渐进,无往不通。”

朱熹所以极为注重蒙学教育,写了那么多的蒙学读物,发表了许多关于蒙学的见解,也正在于他意识到了蒙学有其基础性的意义。在他看来,如果没有小学教育作基础,一开始就陷入以冥思穷究为特征的大学教育,“百方措置思索”的结果,只能是“反以害心”。只有以良好的小学教育作基础,“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持守坚定,涵养纯熟”,长大之后,才能“通达事物”,“无所不能”。用一个比喻来说,小学教育是要做成圣贤丕模,而大学教育只不过是“就上面加些光饰”,“点化出些精彩”。他坚持认为,在自幼既失小学之序的情形下,有必要在补上了这一课之后,才有继续大学教育的可能。

古人对蒙学教育的重视,除了基于对蒙学基础性意义的认识之外,还显然是由于下列事实。对于有机会受教育的人来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无受大学教育的可能,小学阶段,既是他们受教育的开始,也是他们受教育的结束。他们受教育的最终结果,仅仅是要掌握最低限度的或日常生活中最必需的读写能力,而不在于格物穷理之类的更大功能。小学教育因此以其受教育对象的众多,以及大多数受教育者的唯一的机会而更显重要。

实际上,在儿童还没有入学之前,具有与小学相同功能的家庭教育

张伯行《小学集解·小学辑说》。

张伯行《小学集解·小学辑说》

就开始了。所谓“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镈革、女镈丝。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门入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目。”十岁才出就外傅入小学。更有甚者，古代还有所谓的胎教，认为妊娠妇女的视立言动，都关乎胎儿的清浊美恶、智愚贤否，因而要“寝不侧，坐不边，立不跛，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斜视，耳不听淫声。夜则令瞽诵诗，道正事”，认为只有这样，生的孩子才会形容端正，才智过人。

明清时期的家训发展

在中国传统家训发展史上，明清两代是一个重要的时期，主要表现为：封建社会转衰而家训发展呈现空前繁荣，并在清代前期达到鼎盛；清代后期，虽然传统家训走衰落，但其中又交织着局部的开新、变革。明清家训在其内容和教化方式上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主要表现在贞节观念的强化、社会风俗教化内容增多、女子家训大量增加、强化宗子教育、商贾家训繁荣，重视个人风操和民族气节教育、宗规族训和家法惩戒的加强、性教育的出现等方面。

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自宋代以来继续转衰的时期，但在中国传统家训教化发展史上，却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并在清代前期达到鼎盛，之后才逐步走向衰落。研究这一时期家训的发展及其变革，对于了解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家庭教育，并借鉴其中的经验教训为今天的家庭教育和道德建设服务，都是很有意义的。

明清时期家训发展的历程。

张伯行《小学集解·小学辑说》
《礼记·内则》。